

创生与成长

——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二十六）

□关明

大会通过了 30 多个决议案，其中包括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组织上的硕果，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总章》中总纲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为宗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会设在广州，并选举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

大会还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标志着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作了重要的准备。

35. 中华劳动者携手 全国总工会创生（下）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之际，向全国发出宣言，宣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

全国工友们！

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

全国工友们！

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

翻阅本次大会的文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有的决议案，几乎没有一句文言文，没有一点八股腔，全是白话文——也难怪，这些文件，本来是写给工人看的。

例如在经济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时说：

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状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用品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求按照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的主要工作。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则这样表述：

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之实现，不知经过了几千百万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还是做 12 点以至 18 点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应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的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长或照旧。

在提到反对虐待工人时说：

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资本家则视工人直与牛

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

说到女工童工问题，则是声情并茂：

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喜欢女工童工，他们是看中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愈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6岁未滿的小孩，终日站着做12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

说到工会工作，简直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

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主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是怎样，都要按照该工厂或作坊是那种产业性质，就都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他们就可以马上很坚决地起来奋斗。

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职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说，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工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

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

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些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

……

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秘密发展工人的组织。时常在工人的家庭里，与工人见面，宣传工会利益，动员工人加入工会。

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会费。每月至少为1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人会费。

在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则如此表述：

（一）工人在其回乡村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

（二）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

（三）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斗争，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

工人教育的决议案，详细到了如此程度：

我们的教育方针，一面虽是注意工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如识字常识等，但最重要的是要用这些日常生活知识材料说明其原因结果，引用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教育的极重要的原则，可说这是我们教育的生命。

工会的开会教工人学习处理本身问题的绝好机会。在可能的时候，还当在非工会会员的工人群众中去开会，去吸引他们参加讨论，吸引他们入会。其余如化装演讲游艺等项是一种最方便最普通的教育，因为可以引起听者之兴趣，而使宣传之意义能深入于一般工人的群众。

这是一百年前工人阶级最高领导机关发布的文件，如今读来，仍有一股清新之气。

会后，邓中夏在《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兴奋地写道：

回想起来，三年前我们是何等幼稚啊！三年前我们曾在广州开过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但是那时候得到些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也议决了九个议案，究其中只有四个议案颇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罢工援助”；第二个是“八小时工作制”；第三个是“组织原则”；第四个是“惩戒工界虎伥”（即现在所谓工贼）；老实

说,这四个议案都不完全,不能满足我们工人阶级全部的要求。然而那时候我们的知识经验,实在太缺乏,所以我们也只能得到那样的成绩。

现在却不同了,并且是大大的不同了。我们历年从种种的斗争中,得了许多正确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所以此次全国劳动大会,各地代表把所有得来的知识经验汇合起来,于是便成功了一个光华灿烂的好成绩,比之第一次大会,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此次大会又通过一个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并且选出了二十五位同志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为大会闭会后全国最高指导机关。我们的各路司令部(各业工会)完成了,从此又有了总司令部的大本营(全国总工会)了,我们的队伍更是严整,步骤更是一致的,战斗力更是伟大无比,这样,我们工人阶级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不是可以计日而待吗?

说起来中国劳动运动的进步,总算是很快啊。欧洲劳动运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有近代意义的革命的劳动运动,还不过近十年来的事。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很短,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之觉悟,革命之要求,奋斗之英勇,组织之进步,恐怕还有为各国所梦想不到的。第一次大会时,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仅只二十七万,此次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已超过五十四万了。曾几何时,而有如此的进步,而且是经过政治压迫很盛时期得来的进步,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于前途抱无限的乐观了。

从此之后,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带领工人阶级,“卷起赤旗三百万,搅得周天火火热。”

36.五卅血案惊世界 省港罢工震英伦(上)

似乎是要检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力量,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刚刚结束,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标志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顾正红惨案。1925年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结束后,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惧和仇视。工人复工后,资方不仅不履行协议,还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各厂工人的抵制和抗议,连绵不止。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工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冲

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人不仅不允许,反而用铁棍乱打。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挺身自卫。内外棉七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穷凶极恶,掏出手枪向工人肆无忌惮地射击,顾正红身中4枪,不治而亡,年仅20岁。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号召工农商学各界社会团体,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反对东洋人杀害中国人的运动。在顾正红惨案第二天,由工商学界35个团体发起,有40多个团体参加的“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宣告成立。雪耻会吁请全国各界援助纱厂工人,号召各界抵制日货,募款救济被难工友,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顾正红公祭活动。面对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并勾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逮捕参加反帝运动的工人和学生,扬言要对被捕学生举行公审,这更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学生的愤慨。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涛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出席。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大示威的决议。因租界当局的会审公堂定于5月30日审判被捕学生,中共决定发动群众在这天下午去租界演讲示威。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200多人在中共领导下,进入租界演讲示威,散发反帝传单,控诉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的罪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帝国主义出动大批巡捕,逮捕讲演的学生、工人,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关押了上百名学生和听众。下午两点多,近万名群众会集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捕头竟然下令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刹那间,南京路上血肉横飞,当场打死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等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南京路上血色弥漫,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把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组织全市民众实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未完待续)